

上编

源远流长—— 中国古代文化与世界

一、气象恢宏的古代文化

独步世界的农耕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发祥较早、农耕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农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其中尤以温度和水源最为重要，所以古代的农业文明多发源于有河流灌溉、气候较为温暖的地区。中国与印度、埃及、巴比

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印度文明发源于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以后又扩展到恒河流域和德干高原，埃及文明发源于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发源于西亚的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三个文明都是在较单一的水系、较小的面积上产生的，如埃及文明仅依托于三四万平方公里的尼罗河冲击平原。与以上文明相比，中华的农业文明是在更为广阔的地域上产生的，其中仅黄河流域便达七八十万平方公里，黄河和长江两大农业区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在历史上，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当黄河流域的农业日趋衰落之时，农耕的重心便转移到长江流域，从而使中华农耕文明能够持续发展。另外，与两河流域的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发源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不如两河流域优越，因而中华农耕文明发源晚于两河流域。

农业生产工具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中国古代的农具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距今 1 万年至 8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当时的人们用砍砸器和石斧将土地上的树木砍倒、晒干、焚烧，然后用削尖的木（竹）棒挖穴播种。在距今 8000 年至 5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了成套的农具，包括砍削用的石斧、松土和翻土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石镰、加工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生产进入锄耕阶段。由刀耕火种时期每年易地的“生荒耕作制”转变为在几块土地上轮流种植的“熟荒耕作制”。到距今 5000 年至 4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使用效率更高的双齿木耒和扁宽薄大、装有木柄的石铲，同时，出现了石犁和犁状石器。商代时，开始出现了为数尚少的青铜农具。春秋时期，铁制农具产生，这是农业生产工具

发展中一次巨大的飞跃。铁制农具的使用，使农业生产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同时，铁犁的使用又与农耕联系在一起。“犁”的下半部为一“牛”字，可见二者的密切关系。汉代农具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犁铧上，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大形犁铧等，铁犁铧的渐趋大形化，使耕地深度增加了，同时，又广泛使用铁犁壁，犁铧安上犁壁，有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汉代的犁壁有菱形壁、板瓦形壁、方形缺角壁、马鞍形壁，前三种向一侧翻土，后一种向两侧翻土。犁壁的出现是犁耕改革中的重大发展，欧洲的犁耕直到 11 世纪才使用犁壁，比我国晚 1 千年。汉代还发明了一种播种机械——耒车，有三个铁制耒足，同时播三行，一人一牛一天可播种一顷地。唐代出现了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比以前的犁有了很大的改进，由铁制的犁铧、犁壁和木制的犁底、犁箭、犁辕、犁评等 11 个部件组成，结构完善。唐以前的犁是长直辕犁，比较笨重，转弯、掉头困难，一般用两头牛牵引。曲辕犁犁短而弯曲，灵便有力，掉头和转弯方便，只用一头牛牵引即可。犁铧的上面增加了犁壁，能够推动犁铧翻起土块，并碎土，加快了耕地速度，又能用犁评控制耕地的深浅，曲辕犁的出现是我国犁耕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我国封建时代耕犁发展至曲辕犁基本定型，直到近代，我国农村仍在使用这种犁。曲辕犁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耕犁。唐朝时，唐犁“唐耒”“唐耨”“唐箕”“唐碓”“唐臼”农具传入日本，在日本被广泛使用。北宋时，北方普遍使用安装铁铧的耒车，提高了播种速度。河南地区有人发明了一种人力翻土工具——踏犁，以补耕牛不足。鄂州（今湖北武昌）农民创造了一种插秧工具——秧马，一日可插千畦。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国古代各朝代都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发达的水利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了芍陂，灌溉“云梦之野”，灌溉工具也出现了“桔槔”，即利用底部系石、顶端挂桶的杠杆提水。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提高，为兴修水利提供了比较锋利的铁工具。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蜀郡守李冰主持修筑的都江堰，都江堰是一个防洪、灌溉、航运的综合水利工程，李冰采取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都江堰保证了 300 余万亩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关中的郑国渠也是当时规模宏大的水利灌溉工程，郑国主持，耗时十年修成。郑国渠干渠总长近 300 华里，灌溉面积约 4 万余顷。

汉武帝时，又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徐伯主持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长达 100 多公里，不仅漕运便利，而且沿渠两岸万余顷土地可得灌溉。同时，修龙首渠，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代田地，并采用“井渠法”，用凿井的方法代替开沟，使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土质疏松的商颜山，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修成国渠，全长 220 里，可灌溉万余顷土地。又在郑国渠上游修建了六条辅渠，称六辅渠。又修白渠，从仲山口（今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渠长近 200 里，灌溉农田 4500 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这些渠道在关中地区形成了一个灌溉网。又修建陂塘，陂塘是利用自然地势修建的水库，用以蓄水灌溉。东汉时期，也修建和扩建了很多陂塘。如汝南地区的鸿隙陂修复后，可灌溉几千顷土地。三国时期，曹魏在北方修建了许多较大的水

利工程，如河北的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白马河、戾陵堰，淮河流域的芍陂、茹陂、太寿陂、睢阳陂等，其中仅芍陂可灌溉万顷田地。

唐前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水利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自唐高祖至唐玄宗，全国兴修水利计 160 余处，遍布南北。北方的水利工程多是开渠引水灌溉，南方则多筑堤、堰、陂、塘蓄水工程，如眉州彭山（今四川彭山）修通济大渠一条和小渠 10 条，可灌田 1600 顷。北宋是中国农田水利发展的时期，当时，在河北、关中、淮南、江南、两浙大兴水利工程。其修复、修建渠堰的数目和灌溉面积，远迈以前各朝。南宋时期，南方修建的水利工程项目又超过了北宋，仅在今苏、浙、闽所修水利项目便超过北宋 85%。南方农田只要有水利条件，农作物可一年两熟，大幅度提高了土地的产出量。明初，为发展农业，政府亦大兴水利工程，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统计，全国府县开堰 40987 处，治河 4162 处，整修陂渠、堤岸 5048 处。清康熙时，完成了混河（后改名永定河）的修浚工程，开凿了一条长 200 余里的新河道。

治理黄河是中国古代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它对于保护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汉武帝时，曾征调几万民工修瓠子口河堤，并亲自巡视工地。经此修治，黄河下游在以后 80 余年中未发生大的水灾。东汉时，在著名水利工程家王景、王吴主持下，黄河流域几十万人民修渠筑堤，战胜了黄河水患，使其后 800 余年，黄河没有改道，减少了水灾危害。明万历年间，张居正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和淮河，颇见成效。康熙时，又用水利专家陈潢，采取疏导和筑堤相结合的办法，耗 10 年时间，修复了黄、淮故道。

农业生产技术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它也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水平。西周时期，盛行二人合力的耦耕法，确定了土地休耕轮作制度，并且使用绿肥和制造堆肥。战国时，人们注意辨土施肥，普遍使用人和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积肥、施肥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因素，欧洲直到 10~11 世纪才开始施肥。同时，人们也很重视深耕除草、注意农时和疏密关系。汉代推广“代田法”，把宽一步、长百步的一亩地，纵分为三圳、三垅圳、垅各宽一尺，在圳内播种，苗长高后，用垅土培固，以抗旱防风。第二年，圳垅互换位置，调解地力。采用这种耕作法，可使产量比普通田增产 1~3 斛。又有适合山地和城邑附近园田的“区田法”，这是一种园艺式的耕作技术，把土地划分为小区，集中使用肥料，精耕细作。这一时期，加工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出现了畜拉石磨、风车筛谷扬糠、水碓和水推磨等。北宋以前，南方种麦尚不普遍，南宋时，南迁的北方人种植春小麦，使很多地方形成一年两熟的稻麦连作制度，提高了粮食产量。宋元时代，农业施用的有机肥料有 60 多种，并讲究合理施肥以使地力常新。

耕地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两个显著标志。人口的增加为农业提供了大批劳动力，又促进了垦田面积的扩大。由于战乱等原因，中国古代人口数量并不稳定，但是，一般情况下，都能保持在 6000 万左右，如西汉末年为 5900 余万，唐开元、天宝时期为 5292 万，因政府清查户口的统计数字往往比实际数字要低，故史家估计，当时人口大约 6~7 千万。明初人口为 6659 万。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全国人口大量增加，乾隆六年(1741 年)人口为 1.43 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达 3.1 亿，道光十四年(1834 年)时，人口已增至 4 亿。

中国的耕地面积，在西汉末年为 827 万顷，唐天宝年间为 800~850 万顷。北宋和清代的垦田面积均在 900 万顷左右。

早在距今 8000~5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我国农作物北粟南稻的格局便已确定，粟类耐旱，宜于在北方种植，南方气候温湿，宜于水稻生长。河姆渡文化遗址的第四层发现了约 400 平方米、厚 40~50 厘米的稻谷遗存，经鉴定是人工栽培的籼稻，这说明我国栽培水稻有七千余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之一。西汉时，农作物品种大为增加，有粳稻、高粱、薏仁等，还有从西域传入的石榴、芝麻、胡桃、西瓜、苜蓿等作物。北宋时，从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在南方普遍推广，其稻抗旱力强，生长期短，为江南双季稻的推广提供了条件。同时，茶、棉等经济作物亦广为种植。

战国时期，我国已普遍种植稷、黍、稻、麦、菽、麻六种粮食作物，亩产可达 1.5 石，战国时，一亩合今 0.32 亩，1.5 石约为 45 公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属高产了。南宋时，长江中下游地区亩产可达二三石，多者五六石，因此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清代南方稻米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甚至达六七石。台湾稻米一年所产足够四年之用。可见当时农业发展水平之高。

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农业，不仅是中国文化依托的物质基础，而且在世界农耕文明中，亦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为世界农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别具神韵的汉字

文字的发明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国内

多数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的刻画陶文，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陶文有 9 种文字符号，它们形状固定，结构规则。这些文字距今约 4000~4500 年。

以后，汉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因资料缺乏，尚难于描述其过程。殷商甲骨文的发现，是文字研究中的大事件。早在清光绪年间，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翻地时，多次发现龟甲、兽骨，当时作为中药“龙骨”按斤售给药铺。1899 年，精于金石之学的王懿荣首次看到甲骨上的文字，遂高价搜集。甲骨文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收搜、研究者众多。至今，共出土殷墟甲骨 10 万片左右。甲骨文有 5000 多个单字，可识字不足 1000 个。甲骨文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它基本体现出汉字结构规律，“六书”皆备。

“六书”是古人归纳总结的六种汉字造字规律。“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六书”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后世多以许说为准。

“象形”，是汉字的主要特征之一，象形字是由图画抽象而成的表意符号。如 ☉ (日)、𠂇 (月)、𩺰 (鱼)、𦨇 (舟)、𠂇 (目)、𠂇 (皿)、𠂇 (弓)。甲骨文中的象形字数量最多，约占可识字的 37%，以名词居多。“指事”，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意，上、下是也。”即用点、划指出位置等较为抽象的意义。如一、二、三、四等积画表示一、二、三、四等数字，𠂇、𠂇 表示“上”，𠂇、𠂇 表示“下”，𠂇 的短划表示树梢，所以为“末”，𠂇 的短划指树根，所以为“本”。“会意”，指以两个以上的字组合为一字，表示一个新意思。如“武”，由止、戈两字组成，

意为荷戈行于路。日、月两字组合，交相辉映为“明”。以手逮人为“及”，二人相随为“从”，二人相背为“北”，人言为“信”，两足在水流之左右为“涉”，表示涉水，人在器前为“即”，两手分解牛角为“解”等。会意与指事两类字占已识甲骨文字数的40%。“形声”，许慎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①即形声字一半为取义的形符，一半为声符，“江”、“河”均为水流名，故从水旁，但是读音不同，“江”读“工”；“河”读“可”（均为古音）。“孟”字上为声，下为形。形声字是一种比象形、会意、指事先进的造字法，它将很多象形、会意的字变成形符、声符，再以之相互配合，基本符号不增加，却造出无数新字，便于记忆和识读。如“工”，从“水”为“江”，从“系”为“红”，从“鸟”为“鸚”。商末，形声字明显增加，约占可识字的18%左右，现代汉字中，形声字则多至80%左右，可见，形声字是汉字发展的趋势。“假借”，许慎说：“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②即借用已有汉字中的同音字，表达本意之外的意思，使一字多义，而不必另行造字。如“我”，本为一种兵器的象形，以其音与第一人称的“我”相近，故借用为第一人称。“转注”，学者对其确切含义，颇多分歧，有形转、音转、义转诸说。

商代的甲骨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这类文字铭刻在青铜器上，过去人们最重青铜器中的钟和鼎，故往往以“钟鼎”作为青铜器的代称，因而金文又称“钟鼎文”。金文比甲骨文有所进步，这主要表现在象形、会意字被大量淘汰，这类较原始的造字法也基本停止使用。金文中新造了大量的形声字，从而使形声字在文字

①② 许慎：《说文解字》。

中的比例激增。目前尚无金文形声字数的统计，郭宝钧对金文中衣、食、住三部分文字的统计为：甲骨文期这三部分字数 15 字，金文期为 71 个，其中 46 字为形声字。

战国时期，汉字数量较前代增多，而且由于打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下层平民有了掌握文字的机会，从而使文字的使用人数更为增加。另外，战国时期，由于地方势力和区域文化的影响，汉字陷入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态，各地区发音不同，字的形体、风格不同。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战国文字有东、西二土之别，《说文解字》中的籀文为西土文字，即秦国文字，古文为东土文字，即六国文字。秦国文字的正体后来演变为小篆，战国时期，秦文字的俗体演变为隶书。

秦统一中国后，规定以小篆为标准文字，以达到在统一国家中的“书同文”。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一举措结束了战国以来文字异形的局面，对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共同民族文化心理的强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歌颂秦始皇功绩的“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等，相传为李斯所写，是标准的小篆。

小篆笔画圆转，书写比较困难，后来，民间的俗体字隶书便逐渐被人们广为运用，秦朝官府的文书也有用隶书书写的。因其来自下层徒隶，故名“隶书”，又名“八分”。隶书的出现，结束了汉字的古文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阶段，是字形发展过程中一次巨大变革。隶书以前的汉字，都以繁简不同的线条描绘实物之形以表意，隶书将小篆圆转的线条变为平直的笔画，成为简便的书写符号。因其便于书写，在汉代，隶书成为官方的正式字体，取小篆而代之。早期的隶书叫“秦隶”或“古隶”，字形构造保留了很多篆书的结构。后来，在使用过程中，不断简化、加

工，逐渐成熟，成熟的隶书又称“汉隶”。稍后，在隶书基础上，出现了一种草书，称“隶草”或“章草”，隶草的笔画较为潦草，笔画间相互连绵或省略笔画，加快了书写速度，多为人们起草时使用。

汉魏时期，在隶书和草隶的基础上，演变出一种新的字体——楷书。楷书字体横平竖直，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成为通行字体，一直沿用至今。此外，当时还流行一种行书，与楷书相较，笔画有些灵活的变化，变化较少、字体接近楷书者，称“行楷”，变化较大、字体接近草书者，称“行草”。晋代以来，书法家多擅行书。行书也是至今仍然使用的字体。

古代印刷书籍，多用楷书。明末清初，出现了一种楷书的变体——宋体字，是在宋代印刷字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故名“宋体字”，这种字体至今仍在沿用。

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书写的需要，汉字不断地改变形态，它的进化也从某一角度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迁。这一以表意为核心的文字体系，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

在历史上，汉字还传入朝鲜半岛，新罗通用汉字，在南北朝时期，新罗以汉文撰写成国史，唐朝时，用汉字的音、义标记朝鲜语，在此基础上，朝鲜后来才创立了自己的文字。日本在 8 世纪以前一直使用汉字，后来，在唐学习了 17 年之久的吉备真备回国，用汉字楷体偏旁创“片假名”，始开始日本文字。空海用汉字草体偏旁创“平假名”，这两套假名便成为日文的字母。

卷帙浩繁的典籍

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汉代刘歆把宫廷藏书分为七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略”下分“种”，“种”下分“家”。因这部目录包括七大类，故名《七略》，“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分类法。西晋武帝时，荀勖又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记儒家经典，乙部记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丙部为历史书籍，丁部记诗赋。《隋书·经籍志》正式确定经、史、子、集的名称和顺序，这种四部分类法是中国古代延用最久、影响最大的分类法。

所谓经书，包括儒家经典及其历代的注释。孔子修订、整理《诗》、《书》、《礼》、《乐》、《春秋》作为课本，教授学生。汉武帝时，确立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①的国策，儒家思想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于是，上述典籍与《周易》便作为经典，取得了特殊重要的地位。汉代时，《乐经》已佚，又增加《孝经》、《论语》，合为七经。唐代，《礼经》分为《周礼》、《仪礼》、《礼记》，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升为经书，又增加《尔雅》，遂为十二经。宋代，再增《孟子》，合为十三经。

《诗经》为中国第一部古代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大类。《书经》即《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

《周易》本为占筮用书，战国时期，儒家对其作了哲理化的阐释，遂成为儒家经典。《周礼》所记多为西周制度，《仪

^① 《汉书·武帝纪·赞》。

礼》记录了周代礼制。《礼记》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择集,共 49 篇。春秋三传是对《春秋》的阐释,《左传》偏重于史实解说,《公羊传》和《谷梁传》偏重于阐发“微言大义”。《论语》在西汉时有《古论》、《鲁论》、《齐论》三种,东汉郑玄混合各本,成今本《论语》,共 20 篇,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行为。《孝经》为孔门后学论述孝道和宗法思想之作。《尔雅》是古代训诂资料汇编。《孟子》一书记述了孟子的言行。历代解经著作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经部之书多达 1773 部,20427 卷。

我国的史籍浩繁,史部著作,详见史学部分。

《汉书·艺文志》分子部书籍为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小说计 10 种。先秦诸子对后世的学术文化影响深远。主要的子书有儒家学派的著作《论语》、《孟子》、《荀子》等。墨家学派的著作《墨子》等。道家学派的著作《老子》、《庄子》、《列子》等。法家学派的著作《商君书》、《慎子》、《韩非子》等。兵家著作《孙子》、《吴子》、《孙臆兵法》、《尉繚子》、《六韬》等。其中,《孙子》为春秋孙武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兵书,也是古代军事发展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阐发了孙武的战争观、战略理论和战术思想,号称“兵经”,被翻译为多种外国文字,深受推崇,日本人称之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

《四库全书总目》中,将子部书分为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农、类书、小说、释、道 14 种,涵盖甚广,故子部著作数量繁多。

“集部”是诗、文、词类书籍的总称。《四库全书》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汉成帝时,刘向把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刘向等人的模仿之作辑为一书,称作《楚辞》。南北朝

时,南朝萧统编《昭明文选》,收录先秦至梁诗文 130 余家。陈徐陵编《玉台新咏》10 卷。唐许敬宗编《文馆词集》1000 卷。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辑了我国最早的词总集——《花间集》。宋代的诗文集有吕祖谦编的《宋文鉴》、李昉编的《文苑英华》、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姚铉编的《唐文粹》等。元代苏天爵编的《元文类》,明代程敏政编《明文衡》。清代所编的诗文总集主要有王士禛的《古诗选》、沈德潜的《古诗源》、陈沆的《诗比兴笺》、杜文澜的《古诗谣》、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另外,还有《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全唐文》、《宋诗钞》等断代诗文集。别集是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历代文坛名家多有别集行世。

此外,中国古代还有类书和丛书。类书是为检阅方便,将各种知识内容的书分门别类地编辑在一起,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三国魏文帝时,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类书——《皇览》。隋代的《北堂书钞》共 173 卷,是我国现存最早具有相当规模的古类书,清人将它与《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合称为“四大类书”。唐代所编《艺文类聚》100 卷,全书 46 部,727 个子目,引古籍 1431 种,其中 90% 为今所不存之书,该书保存了唐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并开创“事”与“文”合编共类特色,对后代类书的编纂影响很大。另外,唐代编《群书治要》50 卷编《文思博要》1200 卷另目录 12 卷,卷帙浩大,包举广泛,惜乎南宋时失传;又编《三教珠英》1300 卷另目录 13 卷(今已失传)编《初学记》30 卷,此书在唐代类书中以精要为特色,深受历代学者喜欢,流传不绝。

宋代编纂了四大部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其中以《太平御览》和《册

府元龟》价值最高。《太平御览》为李昉等编纂，引书 1690 余种，分 55 部，4558 类。该书史料来源不限于正史，兼取唐、五代各朝实录，史料价值颇为后人所重视。初名《太平总类》，宋太宗每夜阅读 3 卷，故赐名《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由王钦若、杨亿编纂，辑录上古至五代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分 31 部，1104 门，其资料主要来源于 17 史，间取经、史，而在唐和五代部分，又采用当时仍存的各朝实录，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原始资料。引文多整章整节移录，对宋以前史籍的辑佚和校勘很有价值。《太平广记》是野史小说方面的类书，共 500 卷另目录 10 卷，按内容分为 92 类，采录了汉至宋初的小说、笔记、野史中的故事，保存了大量的古小说资料。《文苑英华》1000 卷，辑录南朝梁末至唐代诗文，本书所保存的大量诗文，为《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所取材。另外，南宋王应麟编辑《玉海》，这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类书，计 200 卷，分政、地理、官制等 21 门，保存了很多宋代的史料。

明代成祖时，由翰林学士解缙组织 3000 余人，历时 5 年，编纂成大型类书《永乐大典》。该书 22877 卷另目录 60 卷，分装 11095 册，约 3.7 亿字，辑入图书七八千种，内容广及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汇集古籍数量空前，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史资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清代编《四库全书》时，从中辑出古代佚书几百种，《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等重要文献，赖《永乐大典》得以传世。《永乐大典》修成后，仅抄录正副两本，正本毁于明亡之际，副本在清咸丰年间渐散失，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大部分被毁，一部分流散国外，至今国内外仅存 300 余册。

清代康熙、乾隆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编纂

工作，康熙、雍正时，由陈梦雷、蒋廷锡先后主持编纂了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计 1 万卷，约 1.6 亿字，分历象、方輿、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每编下分若干典，典下又分若干部，每部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目，搜集宏富，条理清楚，便于检阅，是我国现存类书中规模最大的一部。

丛书是将多部书合为一编。中国古代最早的丛书是南宋俞鼎孙、俞经编的《儒学警悟》。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是清代的《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纪昀等著名学者 160 余人开始编修，历经 10 年始成。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书 3503 种 79330 卷，装订成 36000 册。《四库全书》修成后，共抄录七部，分藏于北京、热河、沈阳、扬州、镇江、杭州六地，现存四部，该书较完整地保存了大量古籍。但是在编纂时，对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典籍，大量销毁，全毁 2400 多种，抽毁 400 多种。该书编成后，纪昀等人又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 卷，扼要地介绍了每一本书的渊源、内容、版本。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凝结了历代无数学者的聪明才智，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而且也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嘉惠人类的科技

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技发明为数众多，这在世界上是无以伦比的。中国古代的科技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具有世界上最丰富、最系统、最完备的天象观测记录。中国是世界

上最早记录日食、月食的国家。殷商甲骨文有 5 次日食记录,《春秋》中记载了 37 次日食,其中有 32 次是可靠的记载。中国关于彗星的最早记录是公元前 1034 年,早于西方 1000 多年,最早记录哈雷彗星的时间是公元 66 年,早于西方 670 多年,自春秋至晚清,记载哈雷彗星 31 次,彗星 500 余次,是世界上彗星记录最完备的国家。在世界上,对太阳黑子的记录也以中国为最早,记录次数最多。从公元前 43 年至公元 1638 年,共有 106 次。而欧洲在公元 807 年才第一次记录太阳黑子,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是中国公元前 28 年的一次记录。对新星和超新星的记录也最早见于中国文献,殷商甲骨文中有新星的记录,至公元 1700 年,中国共记录新星 90 颗,其中超新星 10 颗。古希腊、罗马、巴比伦均无新星记录。《汉书·天文志》中还有世界上最早的超新星爆炸记录。

中国古代对天体的观测也取得了许多领先于世界的成就。中国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测天仪器——浑仪,以后又不断地对其进行改进。元代郭守敬等人创制了由浑仪改进、简化而成的“简仪”,又创制了观测太阳位置与日食的“仰仪”和观测日影长度的“景符”等十多种天文仪器。简仪比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同类仪器早 300 多年。简仪中首次安装了滚柱轴承,比达·芬奇设计的滚柱轴承早 200 年。“仰仪”和“景符”第一次利用了小孔成像原理。中国、印度、阿拉伯、埃及、巴比伦的古天文学中都有二十八宿(天上某些星的集合体称宿),但是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建立,可以较准确地测量日月五星相对于恒星的运动,观测异常天象发生的位置,并能准确地决定冬至点所在,对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战国时,石申所著《天文》记录了 121 颗恒星的